



特别策划

爷爷的课

□ 罗金苗

我出生那年，爷爷因听力下降离开了讲台。从学校回来后，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庄稼人，农忙时下田，闲下来便在家照看我。

刚学会走路，我就喜欢跟着爷爷一块下田。路远，他便把我背起来。田埂窄，他走得慢，我抱着他的脖子跟着一晃一晃。

到了田边，爷爷先看水。水多了，他便挥锄在田埂边开一道口子，把水放出去；水少了，就俯身扒开进水口，把渠里的水引进田里。我就在他旁边，脚下，车前草贴着地面摊开叶片，雷公根顺着湿土往前爬，一点红从杂草间探出小小的红花。

我蹲下来，指给爷爷看：“这个叫什么？”他放下锄头，看一眼，说出一个名字。走几步，我又发现一样，再问，他便又告诉我。今天认识的，过几天碰见，我可能又分不清，只好再去问。爷爷照样说一遍。有时他还会顺手拨开旁边的草，让我看看叶子长什么样。

于是，跟着他去田里，我除了踩泥、看水，也渐渐认识了车前草、雷公根、一点红这些植物。上了小学，我常在老屋大堂写作业，头顶是一盏昏黄的灯，吊扇吱吱呀呀地转个不停。

碰到作文写不下去了，我就去问爷爷。

“这个怎么写？”我问一遍，他没听见，偏过头来大声问：“你在讲什么？”

我只好再说一遍。第二遍还是听不清，我便有些烦了，把音量抬高：“我是问，这里怎么写？”

爷爷接过本子看看，又让我把题目念一遍。哪里听不清，他就再问。我一句一句地讲，他侧着耳朵听。

我嫌一句一句话要重复两三遍，作文写完，本子一合，跑开了。爷爷也不恼，只是对着我笑。

再大一些，我学会了用电脑，爷爷隔三差五会拿来些他的手写稿，让我帮忙敲进电脑投稿。也是从这些手稿里，我才慢慢看到一个站在讲台上的爷爷。

1962年，他高中毕业回村。那时村里文化人少，在村民的要求下，他当起了村里民办小学的第一任老师。几年后，他又去了公社的农中，老师仍然只有他一个。当了十八年民办教师后，爷爷去考了师范，进修两年，转成公办教师。

爷爷的手稿里有一篇文章叫《难忘第一个教师节》：1985年，他教4个毕业班的政治课，那年中考，政治成绩突出，他被评为县里的先进教育工作者。9月10日，全乡中小师生到乡政府礼堂庆祝教师节，爷爷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，上台领奖了。当时是什么盛况？爷爷没有细写，但文章末尾，他写道：“历历在目，终生难忘。”

这些往事，爷爷很少跟我讲。替他录完那些稿件，我才知道，那个下田、看水、听力不好的爷爷，曾经在讲台上站了那么多年。

2013年，我上高中，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了。爷爷知道后，给我写来一封手写信，从我的考试成绩说到高中学习，又谈到高考。方正有力的字铺满了四页纸。

信里有一句，我来常常想起：“不教同冠军较量，我永远得不到冠军。”这是爷爷勉励我的话。他告诉我，读书要肯下功夫，要敢于“学先进、赶先进、超先进”。这样的说法果然像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老教师，先问成绩，再看差距，最后还要给学生定一个更高的目标——虽然写信的对象只是自己的孙女，他还是习惯性地把话说得严肃又认真。

后来，我求学、工作，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。备考时有过压力，走上工作岗位后也常有忙乱和疲惫；写文章，更尝过一次次投稿没有回音的滋味。迷茫时，我常会想起与爷爷相伴的那些日子，想起他的那些话：“眼前的东西要认真真弄明白，想做的事情也别轻易放下。”

又是一年教师节。我把爷爷的那封信拿出来。方格稿纸留下了折痕，爷爷的字迹仍然清晰。翻到最后一页，“身体健康，学习进步，万事如意”，爷爷的字写得方正又有力。

樟树下



师者，谓何

□ 田雪梅

的王阳明，也曾被学生叫作“山长”。

“博士”始于战国，原是个学官名。汉武帝设五经博士，地位很高，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。到了宋代，各府县设“教授”，唐宋以后，官学里的教师开始有了“教授”之名，并逐渐普及。苏东坡曾被贬为贵州团练副使，但人们依然叫他“苏学士”，因为他在翰林院做过“教授”。

古人称老师为“师傅”，《谷梁传》里就有记载。“傅”字，含辅佐之意。就像木工要辅佐一根木头成为栋梁，师傅要辅佐一个孩子成为君子。后来演变成“师父”，“父”字，分量就更重了。南唐《中朝故事》里说，学生对师父要“事之如父”。元杂剧里常有这样的场景：师父犯了事，徒弟拼了命也要去救。

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，我读《宋史》，看到李覯的学生在他去世后，为他服丧三年，就跟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。这让我想起我

的父亲，他年轻时拜过一位木匠师傅，每年过年都要提了礼盒去看望，直到那位师傅九十多岁过世。父亲说，拜了师就是一辈子的情分，跟认了干亲差不多。

汉明帝是个懂得尊师的人。他做太子时，师从桓荣；登基之后，仍以师礼待之，去老师府上，一定要让桓荣坐西面东，自己甘居宾位，执弟子礼。从此“西席”“西宾”便成了教师的代称。

古人称呼教师，有“宗师”“师保”，“师保”辅弼帝王，“宗师”受人崇仰，这些称呼饱含着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敬畏。如今“教谕”“训导”“学正”这些称呼都已沉入故纸堆，“教授”“讲师”成了职称名称，“老师”这个词在唐宋时泛指资深学者，到了元明才渐渐通用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师者，称呼变了又变，但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，值得我们用一个最郑重的名字去称呼。

如果时间能倒流

□ 谢汝平

时光荏苒。回首学生时代，我最难忘的是小学四年级时，陈老师给我们上的最后那堂课。

陈老师是语文老师。那天上课，他例行检查我们班课文背诵情况，但点了六七个同学，竟然都不会背，其中也包括我。其实，背诵课文是我的强项，一篇课文拿到手里读几遍，我就能背下来。可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竟然把背诵课文这事忘得一干二净，根本就没有读，又怎么能背诵出来呢？别的同学估计跟我的情况也差不多。

作为一名要求严格的老师，陈老师当时就生气了。课上，他讲了很多，大意是学生就应该珍惜时间，好好学习，不能只顾着玩，把功课荒废了。尤其是应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，好好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。

陈老师快六十岁的人，个子不高，但批评人时痛心疾首，音量越说越高。我们几个背不出课文的人，越听越觉得无地自容。

如果就这样，这也就是平常的一堂课，没什么稀奇的。

但陈老师的这堂课，其实惊心动魄，让我们终生难忘——就在陈老师批评完我们后，他身体突然前倾，双手扶着讲台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我们这些四年级10岁左右的孩子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想着这是把老师气得够呛了？

在全班目光中，陈老师扶着讲台，做

了几个深呼吸。但他仍然控制不住自己，身子一直在抖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

看着陈老师有点扭曲的五官，同学们有的想要去扶，有的跑出教室去喊人。闹哄哄中，只听到一声响，陈老师倒在了地上。

很快，隔壁班的老师来了。如果是现在，打个120急救电话，救护车很快就能来。可在那个没有手机、交通工具也不发达的年代，大家能做的也只能是七手八脚抬着陈老师往医院跑。

被送到医院的陈老师还是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，虽抢回了一条命，但只能拄着拐杖走路，说话也不清楚。

那节课后，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讲台。后来，我们常在校园里看到拄着拐的陈老师，不能利索说话，不能利索走路，甚至不能利索地叫出我们的名字。

据说后来他被调到了学校后勤部门。这么一名负责任的老师，因为我们的不听话而被气倒，我们班每个人心底都像压了块石头，很长一段时间气氛压抑。后来，校长亲自和我们谈心，说陈老师生病是因为他长期劳累透支了身体，与我们无关，但我们还是不能释怀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陈老师倒下去的样子，仍然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一定要把那篇课文背得滚瓜烂熟。

把刺酿成回甘

□ 游贵阳

“叮咚”，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：“老师，我是林小满，教师节快乐！路过母校，银杏叶落了，捡了一片寄您。当年那件事，我把能找到的都装进信封里了。原谅我。”

手机屏幕的光白白的，刺得我眯起了眼，但记忆的闸门“哗啦”一下打开了。

林小满，班里最文静的女生。常坐后排靠窗位子，写作业认真，页面干净，但从不在课堂上主动举手发言。

可我偏偏对她印象深刻。有次批改周记，她的本子里滑出一张窄窄的便签，上面写了一行小字：“老师，您今天课上说，‘每片叶子落下的角度都不一样’，我看了窗外好久，觉得真好。”字迹工工整整，像她的人。我在末尾回了一句：“那你就是那片还没落下来的叶子，角度是特别的。”

后来，讲评期中试卷，我余光瞥见后排，她头埋得低低的，手在课桌下飞快地搓弄着什么。那阵子班里成绩忽上忽下，我心里本就压着火，见她这样，忍不住走过去一把抽出手中的纸——“为什么大人永远只看到分数？我讨厌这样！”纸上这句话一下子刺激到了我。

当着全班的面，我把纸啪的一声拍在讲台上，冷冷地盯着她。她猛地一颤，像只受惊的鸟。

她把头抬起来，直视着我，眼神倔强。

“一往情深”

□ 卢兆盛

前不久，几个数十年未见的小学同学聚会。大家回忆往事，谈起任过课的小学老师，一致觉得最对不住的是张庆生老师。

当年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被学生私下取了外号。张庆生老师虽然未获此“殊荣”，其大名却也常常被学生提起。

张老师是数学老师，在四年级时教我们班并担任班主任。平时他对大家要求很严，自然“得罪”了不少学生。公社一把手的女儿、文娛委员刘菲菲就曾多次和他顶嘴，张老师拿她没办法。

那时流行预备铃响了后，大家先唱一首歌。我们班唱得最多的是《沂蒙颂》，特别是遇到张庆生老师的课，几乎就只唱这一首，而且特别来劲。时间一长，张老师感觉不对劲，问刘菲菲，刘菲菲回答说同学们就是喜欢唱这首歌啊，没有什么。再问其他同学，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。

这天上课，张老师刚进教室，刘菲菲又指挥——“蒙山高，沂水长……预备唱！”同学们挤眉弄眼迅速进入状态，当唱到“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，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”这句时，张老师脸色骤变，大吼一声：“停！”

叫停的原因就是大家唱“情深意长”时咬字发音特别重特别狠，甚至夸张到有点变调了。

仔细品，张老师回过味来。原来“情深”是“庆生”的谐音！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张老师便在班里对大家点名批评、罚站、罚抄课文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可谓是办法用尽。但过不了多久，班里仍然故态重萌，“情深意长”照唱不误。每每唱到这，同学们偷笑有之，做鬼脸有之，也不管张老师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

五年级时，张老师去教了另外一个年级，不再管我们。我们班《沂蒙颂》也渐渐唱得少了，就算唱，大家也不再像原来那样来劲。

“情深意长”，这个梗后来成了我们班聚会时不断提及的话题。但随着年岁渐长，我们感觉到了这种恶搞对老师的伤害。当年是为了好奇？好玩？或者纯粹是跟风瞎闹？这种类似固执的幼稚，最终让张老师大伤自尊“招架不住”，选择不教我们了——这是我们挤兑走了张老师啊。

其实，张老师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。那时候，他患了病，身上经常揣着药。有时正上着课，突然就看见他放下教鞭，眉头紧皱，从衣兜里拿出药，仰头一口吞下，缓过来，又继续上课。

这样的场景，我们多次看见。张老师不苟言笑，但对生却细致关爱。记得有年冬天，学校边上的水田结满了冰，班上两个贪玩的男同学跑到田里去“滑冰”，结果，冰破鞋湿，两人双脚冻得发红。张老师知道后，马上把他们带到自己宿舍，生起一盆炭火，让他们换上自家孩子的干净鞋袜。

再一年，我们小学毕了业，张老师也调去了另一个学校工作。后来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若干年后，有热心的同学几度想张罗张老师参加我们的聚会，遗憾的是一直没成。

此次小聚，得知年逾八旬的张老师仍身体健朗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有的同学又提议下次聚会一定要请张老师，告诉他，当年我们虽不懂事，但其实对他真是“一往情深”啊！


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